

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

雷蒙德·威廉斯于1921年出生在一个与英格兰交界的威尔士村庄，他的父亲是一个铁路信号员。在家乡读完小学和中学后，他作为极少数工人家庭出身的“奖学金少年”，于1939年进入了英国著名的剑桥大学垂尼迪学院，主攻文学。1941年威廉斯应征入伍，成为一名反坦克上尉，他的大学生涯因此中断了几年。1945年10月战争一结束，他立刻重返大学校园并于次年完成了学业。在此后的十五年里，威廉斯以满腔的热忱投身到战后兴起的工人阶级成人教育事业之中。他早期和鼎盛时期的许多重要著作都是在这一阶段完成的，其中包括被誉为文化研究经典之作的《文化与社会 1780—1950》。^①1961年，威廉斯当选剑桥大学耶稣学院研究员兼英文系讲师，直到70年代中才被正式聘为戏剧研究教授。1983年威廉斯提前从这一职位上退休，五年后便过早地离开了他终身热爱的写作和长期从事的文化政治斗争，与世长辞。

威廉斯逝世之后，纪念他的文章连绵不断。人们对他几十年来对英国思想界和文化

政治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在为了一本研究威廉斯的专著撰写的《序言》中，^②牛津大学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将威廉斯与法国的萨特和德国的哈贝马斯相提并论，认为他是战后乃至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文化思想家，是英国左派知识阵营中最具智慧和独立思考精神的知识分子。伊格尔顿还将威廉斯与法国正在当红的、倍受伊格尔顿本人推崇的社会学家包迪厄(Pierre Bourdieu)相比较，认为两人无论在学术独创性还是在政治立场上都有相似之处。令伊格尔顿不解和遗憾的是，在威廉斯生前居然没有一本研究他的专著问世，他作序的这本书也是在威廉斯去世一年后才得以出版发行的。

威廉斯一生的著作很多，涵盖的领域也十分广阔。他生前或独立或与人合作完成并

^①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Chatto and Windus, 1958).

^② Alan O' Connor, *Raymond Williams: Writing, Culture, Politic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9).

出版了近三十本学术著作,发表过几百篇学术论文以及其它类型的文章,另外还从事小说、剧本等文学创作。他去世之后,一些未完成的著作由他的遗孀和女儿整理并出版。威廉斯的著作内容涉及文化批评、政治评论、文艺理论、戏剧研究以及传播媒体,围绕着几个比较明显的主题展开,其中包括英语中心词(key words)意思的变化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文化的民主化(the democratisation of culture),对小说中“可知的社区”(the knowable community)的构思,以及对戏剧中的“多重视角”(complex seeing)的探讨。威廉斯60年代初对传播媒体的关注和研究,为后来英国的传媒与文化研究开了先河,以传媒为载体的通俗文化从此成为学者们研究和批评的对象。这一研究领域在七八十年代迅猛发展,到了90年代已经成为英国大学中的热门。威廉斯的著作在文学批评、文化研究和传媒社会学等领域都有很大的影响。他的学术成就无疑是跨学科的,他的政治信仰和立场更使他一度成为英国左派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

的确,威廉斯的学术研究和他的政治信仰和社会参与是分不开的。出身于落后地区的工人阶级家庭,威廉斯终其一生都坚定地与身处社会底层的人们站在一起,投身到各种进步的社会和政治运动中去,用其擅长的文字写作为工人阶级争取利益和解放。他早在少年时期就在家乡威尔士参加过支持英国工党选举的工作。在剑桥大学读书期间,他又积极参与并组织左派社会主义学生的政治活动,并主编过该校受社会主义俱乐部控制的《剑桥大学报》。政治上激进的青年威廉斯于1939年底加入了英国共产党,并与后来著名的历史学家霍布斯包姆(Eric Hobsbawm)共同写过一个小册子,为苏俄红军占领芬兰辩护。在《每日工人》因被英国官方查封而转入地下之后,他仍坚持为该刊物做编辑工作。应征入伍后的威廉斯虽然已经脱离英国共产党,但是仍对苏俄红军抱有好感,并将自己的战斗与苏俄红军的反法西斯的战争紧密联系

在一起。在英军的军官阶层,持这种政治观点的人自然是极其少数的,而且需要有很大的勇气。

二战结束后,威廉斯重新回到剑桥大学学习,于1946年完成了学业,并成为战后工人教育协会(Workers' Educational Association)的一名教员。在这一并不显赫的位置上,他辛勤地耕耘了十五年,奉献了一生中宝贵的青春年华。在从事成人教育事业的过程中,威廉斯将文化理论与教学和写作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写下了《文化与社会 1780—1950》(1958),《漫长的革命》(1961)^①和《传播》(1962)^②等重要著作,影响了稍后一代致力于文化与传媒研究的青年学者。针对等级森严的英国阶级社会,威廉斯曾极力提倡发展一个“民主的共同文化”(a democratic common culture)。在《文化与社会 1780—1950》一书中,威廉斯选择了英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一些代表人物,探讨他们写作中对“文化”这一概念创造性的运用,追述了从工业革命到20世纪中叶“文化”的涵义随社会变迁而演变的过程。威廉斯摒弃了狭义的文化概念,认为文化不应该仅仅是一个时代高级的精神和艺术产品,从根本上来说它是“一种生活方式”(a way of life),从而在理论上确立了“文化是普通的”(culture is ordinary)这一典型的威廉斯式的立论。这个立论从此成为威廉斯和左派文化阵营与文化精英主义对峙和斗争的理论武器。

在《文化与社会》的结尾章节,威廉斯继而又对英文中 masses(大众)一词进行了解剖和解构。英文中的 masses 含有明显的贬义,指愚昧无知、低陋粗俗的乌合之众,实际上也常被用来指代工人阶级。针对这种情况,威廉斯指出,所谓的 masses 本身并不存在,存在的是一种将活生生的人们看成和当作

① Raymond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Chatto and Windus, 1961).

② Raymond Williams, *Communications* (Penguin Special, 1962).

masses 的视角和偏见。所谓的 mass culture (大众文化)也常被用来指代工人阶级消费的低层次文化产品,后来渐渐被等同于工人阶级文化(working class culture)。这一惯用法在威廉斯看来也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首先,以传媒为载体的低级庸俗的文化形式并不只是由工人阶级消费的;第二,这些文化形式本身也不是工人阶级自己创造的,所以它们根本称不上工人阶级文化。工人阶级的确在消费这种由文化工业制造的文化垃圾,但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利是图。文化工业实际上利用了社会造成的无知,并从中赚取巨额利润。威廉斯还进一步指出,改变这种状况的途径是教育机会的均等。威廉斯认为,英国的工人阶级从工业革命以后就没能再大规模地创造出自己特殊的文化形式,如小说、诗歌、戏剧等。但是,如果把文化看成一种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思想和精神产品以及文学艺术,那么,英国的工人阶级则具有非凡的创造力,他们创立了诸如合作社、工会等民主机构,并具有一种独特的社区归属感和团结精神。这些民主机构加上社区感和团结精神,才是他们独有的、与中产阶级个人主义文化有根本区别的、真正的工人阶级文化。

对威廉斯来说,从威尔士普通工人阶级家庭和社区到英格兰世界著名的剑桥大学,其间心理上的跨度远远超过了地理上的距离。也正是这样一种跨度,使得他对英国的阶级社会以及维护阶级特权的精英文化保持清醒的、毫不妥协的批判态度。他的文化批判目的在于社会和政治变革,将少数人把持的文化(minority culture)变成为多数人服务的文化(majority culture),并同时改变这种文化,促使英国社会向更加民主和公正的方向变革。在威廉斯看来,优秀的文化遗产应该由全社会共同拥有,而不应该被某一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所垄断,成为他们维护本阶级利益和特权的手段。威廉斯关注和研究现代传播媒体,目的也在于使它们成为民主文化的载体。这一将媒体看成既是科学技术又是文

化形式的视角从他早期的《文化与社会》开始,贯穿于后来的《漫长的革命》与《传播》,最集中地体现在《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1974)。^①与许多文化和知识精英对大众传媒(mass media)和大众文化采取的拒斥态度不同,威廉斯关心的是如何利用传媒建立“民主的共同文化”,从根本上改变没有真正民主的阶级社会。对工人阶级生活和文化有切身体会的威廉斯,也自然采取了与欧陆其他左派,如法兰克福学派,截然不同的理论立场。

如果保守的精英们将大众社会和大众传媒看成一种危及文化的、十分可怕的力量,威廉斯却看到了它们所包含的民主潜力。威廉斯认为传媒技术的发展本身就是一场漫长的革命,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可以朝着民主化的方向发展。当前传媒的诸多问题是由资本主义的组织和经营方式造成的。他还多次强调媒体的垄断趋势和市场化的危险性,明确指出商业利益与公众利益之间存在的经常性的矛盾。即使如此,他仍然确信技术本身是中立的,可以为不同的社会和政治目的服务。同时,威廉斯还极力为工人阶级的物质追求辩护,在当时保守的知识和思想界发出令人震撼的不谐之音。他指出,技术和大生产使消费本身趋于一体化,工人阶级在物质上追求的正是中产阶级已经拥有的,而这种追求本身是无可厚非的。实际上,工人阶级并不情愿被中产阶级同化,他们只是希望在改善物质条件的前提下,保持自己特有的工人阶级文化,即社区和团结精神以及真正的民主传统。威廉斯对工人阶级的辩护之辞听起来有时难免有过于美化之嫌,他对资本主义文化工业的批判读起来似乎也不如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等人深刻彻底。但是,如果我们将他的写作和他毕生从事的文化政治联系起来的话,就不难理解他的初衷,即为工人阶级争取平等的生存机会而斗争。威廉斯战后长期从事的成人教育也是这个斗争的一部分,当时

^① Raymond Williams, *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Fontana, 1974).

的成人教育,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文化启蒙而不仅仅是职业培训。

1961年,威廉斯离开多年从事的成人工人教育,到剑桥大学任职。在剑桥这样一个保守势力颇为强大的学术机构,政治上激进、学术上不拘泥于传统的威廉斯所遭遇的阻力是可想而知的。此后的十多年里,威廉斯集中完成了几本文学评论方面的学术著作,于70年代中被聘为戏剧研究教授。此后,他又将精力转移到英语语言中心词语和传播媒体的研究和写作上来。同时,他在《新左派评论》(*New Left Review*)上发表了一系列理论文章,开始与欧陆马克思主义进行严肃的对话。这些文章后来收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中,于1977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①威廉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认真思考和探讨,力求发展他所说的“文化唯物主义”(cultural materialism)。在其中的一篇重要文章中,他从人们熟知的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论说开始,力求重新论证它们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经过一番论证之后,威廉斯得出结论,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实际上可以理解为前者“限定”(setting of limits)后者,或者说对后者“施加压力”和影响(exerting pressure)。在随后的文章中,威廉斯继续详细解释他的这一观点。对马克思主义的严肃探讨,使得威廉斯在理论上有所突破。他开始有意识地用葛兰西的 hegemony (中文不甚恰当地译为“霸权”)代替他自己的 structure of feelings (情感结构)。Hegemony 这个概念更准确和敏感地把握了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中,阶级压迫的含蓄性、复杂性和多样性。它既包含了统治的强制性,又包含了统治的合法性,还包含了被统治者的无奈、默许以至配合。70年代以后,由于对英国激进社会运动的失望和倦怠,威廉斯开始严肃认真地从理论上寻找社会主义的出路。但是,在拥有深厚的自由主义传统的英国,左派社会主义阵营对欧陆马克思主义过早的放弃,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英国长期处

于欠发达状态。这也构成了威廉斯当时新的理论探求的社会背景。他的理论探讨显然不如欧陆的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显得系统和精致。这自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英国思想界的特殊遭遇有关,也说明威廉斯本人并未将理论和学术追求当成目的本身。他的写作显然是以政治斗争而不是以理论精致为目的,况且理论的精致程度与它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并不成正比。

在研究和评价威廉斯时,始终应该强调的一点是,他的写作与他所坚持的普通人的立场和他所从事的文化政治是分不开的。这一点贯穿在他的政论文章、学术研究、理论探讨以及文学创作之中。也就是说,他与所谓的纯学术和纯理论没有缘分,对此也毫无兴趣。他关注的是社会和历史的变迁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疾苦的关系,是这种关系在小说和戏剧等文字写作中的表达,及其在后来的广播和电视等电子传媒中的体现和延伸。这正是威廉斯对文学评论和文化社会学的贡献。这种坚定的普通人立场将威廉斯与当时大多数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区别开来。的确,威廉斯曾公开摒弃英语中文学(literature)一词,取而代之以写作(writing),为的是将环绕在“文学”周围的虚假的光环剥去,使之还原为一种普通的写作活动。面对阶级划分十分明显、等级观念异常强大的英国社会,威廉斯的奋斗目标是一个真正民主和公正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人们机会均等,人为的、象征性的身份差别——诸如口音和所谓的文化品味——不复存在。威廉斯倾其一生都在为靠近这一目标而不懈努力。□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① Raymond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